

直接教學法如何扼殺台語？

問：洪先生提到日據時代的「雙語教育」，其實只是消滅台語的一種過渡手段，不應該受到讚美。日據時期初期使用對譯法，其實效果很差，一九一三年廢了台語對譯，直接教授日語，在語言教學法上的確是一種進步，我們現在的小學國語教育採用直接教學法，就是一種進步的教學法，爲了把國語教好，這有什麼錯？

——台南市 李老師

答：首先我要聲明，我並沒有讚美日本的「國語教育」，不論是它的目的或教學法，都是不值得稱頌的。但是若比較一九一三或一九三七年以前的雙語教育跟以後的皇民化教育，及光復後皇民化式的教育，我認爲前者是王道的，後者是霸道的，這是因爲前者尚可保存台語，而後者則會使台語消滅。

日本初期使用日台對譯的教學法，並沒有什麼理論，純粹是摸索得來，目的是藉由台語以學習日語。這樣的方式效果其實不好，因為語言在本質上是不可能恰當對譯的，對譯法使得學生永遠擺脫不了母語的羈絆，永遠學不好新的語言。我們現在的英語教育可以說是某種形式的英語教學法，學生學了十幾年英語，連大學畢業生見了洋人都啞口無言，便是這個道理。

因此經過許多年的批判與建議，終於一九一三年的「公學校用國民讀本」採用耶斯柏森的直接教學法，廢除日台對譯，不再教台語白話譯文，直接以日語教日語、日文。這種直接教學法效果不錯，使得少數公學校畢業生進入中學校，可以達到和日本人學生「毫不遜色」的程度（山口喜一郎語），但是誠如山口喜一郎所指出的，由於太過迷信直接教學法的功能，教師們誤以為藉重學童母語解釋是一種禁忌，因此使得學童的程度差距懸殊，好的越好，差的越差。而另一個副作用，便是指向皇民化教育，採取絕對禁止學童在校使用「土語」的方針，並在社會中提倡「國語常用家庭」，企圖全面撲滅台語。

但是母語的抵抗力極強，日本殖民當局的陰謀並沒有達成。但卻使得台灣人的台語能力大受摧殘。

戰後，國語推行委員會製訂「台灣省國語運動綱領」，其第一條開宗明義地指出：「實行台語復原，從方言比較學習國語」。但實際實行的結果，卻和日據後期的直接教學法如出一轍——決不用「方言」解釋，在校禁用「方言」，完全是皇民化教育的翻版。

我不否認直接教學法比對譯法優秀，父母教子女學話，本來就是直接教學法，但是我們當知道，我們現在小學實行的直接教學法有許多弊病：

1. 直接教學法在具體概念，或古安氏所謂客觀的語言方面的教學比較有效，至於抽象概念，或古安氏所謂主觀的語言，就很難傳達，不如對譯法或母語解釋來得直接。

2. 直接教學法只能施行於小班制，並且師生關係密切，頂好是師生日夜在一起生活，像母親帶小孩一樣。但學校教育是不可能辦到的。台灣的小學，尤其是都市小學，一班人數五六十人，怎樣把小孩的「國語」教好？

3. 師資是關鍵性的問題。如果老師國語都說不好，如何把小孩的國語教好？台灣的教師，絕大多數的母語本來都不是北京話，怎麼可能把學童的國語教得標準？

4. 最重要的是文化問題。我們現在實行單語教育，又在學校中禁止說「方言」，造成學童母語能力萎縮。如此一來，則台灣傳統母語文化便將隨之失傳，造成民族文化的重大損失。

總而言之，直接教學法在台灣實施是百害而無一利的，現在所有的弊病都已顯現出來。我以一个語言研究者，清楚地看出，台灣的「國語政策」表面非常成功，但其實是失敗的。台灣流行的「國語」到底是什麼樣的國語？我看是不倫不類的，首先發音便極不標準，沒有捲舌音、沒有兒化韻，扭曲的四聲、單調的輕聲（北京的輕聲原是隨前變調，有三四種，台北國語則只有一種，而且數量大減），還有貧乏的語彙（尤其是生活語彙）、錯誤的語法……。這樣的語言根本是官話

的一種「新方言」，無以名之，我稱之為「台北國語」，其語格就像平埔族的鶴佬語，將成為人家取笑的對象。「圓仔花母知釋（醜），大紅花釋母知」，有些人滿口「台北國語」，還以為自己「國語」很標準，真不知羞。

其實說國語不標準是正常的，但悲哀的是國語說不好，台語也說不好。台灣的情形便是這樣，邯鄲學步，沒有一種語言說得好。而其癥結所在，除了語言政策的霸道之外，霸道的直接教學法也是罪魁禍首之一。台灣的國語運動並不成功，只是成功地消滅台語而已。

爲了保存台灣的語言文化，也爲了把北京話學好，我呼籲立即停止這種霸道的語言政策和直接教學法，實行雙語教育，並研究兩種語言之間的同異，從比較中，同時把北京話和母語學好。至於外國語的教學也應該以母國語爲基礎去學習，記取對譯法和直接教學法的失敗教訓，採用最新的語學法教學。

（原載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八日《民進週刊》台語信箱）